



本书由中华诗词研究院资助出版

陈友康

著

现代诗词论丛

XIANDAI SHICI LUNCONG

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

◎ 中华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成果



本书由中华诗词研究院资助出版

詩
詞

陈友康

著

现代诗词论丛

XIANDAI SHIJI LUNCONG

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

◎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陈友康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

（现代诗词论丛）

ISBN 978-7-5622-7178-9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诗词—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132 号

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

◎陈友康 著

责任编辑：庞丹

责任校对：肖绪旭

封面设计：胡灿

编辑室：中华诗词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737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370 千字

印张：25.75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定价：64.00 元

印数：1—1 500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上世纪末，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文汇报》1999年2月6日）二文中指出，“在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之间设置一条鸿沟”，“实在是害处众多而并无好处的”，“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而明确提出要对中国古今文学进行贯通研究的主张。其后直至逝世前，他采取招收研究生、开设学位课程、举办学术研讨会等多种措施，倡导和推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曾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

2007年春，章先生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他指示要我接替他讲授“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门研究生基础学位课程，不知不觉间已将近九年。在课堂上，我曾多次向学员们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

中国本来是诗歌的国度，即使按目前通行的文学体裁分类来衡量，诗歌也是最早形成范式，并且以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由古体诗派生出近体诗，由诗体派生出词体，由词体派生出散曲，各种体式并存共荣，生生不息，从而把汉语言的美发挥到了极致。后起的文体几乎无不向诗歌看齐，包括散文、戏曲、小说，都曾从诗歌中汲取过营养。如果就古典文学四类体裁的成就及其地位做一个排序，我们说诗歌（含词、散曲）第一、散文第二、戏曲第三、小说第四，应该是合乎实际的。但再以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实绩进行评估，小说成就最高、诗歌成就最低是没有异议的，散文与戏剧的名次似乎没有变化，仍分列第二和第

三。为何不到一百年，诗歌和小说的发展情形竟完全颠倒过来了呢？

学员们在讨论中，往往援引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观点作答：“引进现代西方观念后，中国人的文学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所致。”这种判断乍看似乎具有一定的道理，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价值观念，的确与该时期文学的命运密切相关；但中国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一方面具有恒久、稳定的特点，一方面遵循“通变”的规律而发展变化，这一特征即使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仍然发生过重要作用，外来西方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既不可低估，也不宜过于夸大，否则，我们仍然无法解释为何从外国移植而来的话剧与自由诗并未取得突出的成就。

在我进入复旦大学之前，陈友康先生就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过一年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并且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与我本有校友加同行之缘，但直到 2014 年 7 月 10 日在《文学评论》编辑部与广西桂平市联合举办的“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上方才相识相知，接下来又一起出席过国务院参事室与中央文史馆在北京主办的第二届“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2014 年 9 月 16 日）、中华诗词研究院在北京主办的“现当代诗词文学史地位专题座谈会”（2014 年 12 月 1 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中华诗词研究院在上海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华诗词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2015 年 6 月 13 日）等学术活动，通过会议交流与私下交谈而得知，他自 1999 年就开始延伸介入现代旧体诗词研究，稍后又以“20 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而获准立项，一头扎进去后即沉浸于其中，坚持在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同时致力于现代旧体诗词的研究，迄今已达 16 年之久而未改弦易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认为这是“越界”或“不务正业”，而是明确认识到自古至今的中国文学本是一个整体，不必囿于现行不合理的学科分类，因而他能够理直气壮地进行兼顾古今、融合新旧的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换言之，友康教授已经在中国诗歌领域扎实地开展贯通古今的探讨，这与章培恒师自 1999 年以来大力倡导的中国文学古

今演变研究实际上也是相通的。

友康教授所说的“现代诗词”，是指20世纪以来新文学背景下用古典诗体创作的韵文作品，包括诗、词和散曲等，在时间上则包含学界通常所称的现代与当代。确切地说，近16年来，友康教授主要围绕“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课题而展开探讨，收入本书的论文也大多为这项课题的前期成果与阶段性成果。虽然已完成的项目成果内容与收入本书的论文实际涉及现代诗词的诸多问题，但关于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无疑是作者最重视的核心问题，也是学界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因而以此作为书名，实有深意寓焉。

如果仅仅从语言形式着眼，1917年兴起的新文学运动实际是以白话完全替代文言为目标，而在我国文学史上，这种由繁至简、由雅向俗、由文言变为白话的趋势，最迟在宋元时代就开始萌生，到明清时代已称得上成绩斐然。只不过在古典文学环境中这种趋势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整体上仍呈现为诸体竞骋、文白并行、雅俗共赏；而到了现代文学环境中则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白话文学被贴上“新”的标签后，就开始站在舆论的制高点上，表现出一种不给文言文学生存空间的霸气和强势。其中最大受益者显然为现代白话小说与白话散文，它们虽然也分别受到了汉译外国小说、外国散文的影响，但实际上是在宋元明清白话小说（包括短篇和长篇）或明清小品文已有成就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包括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在内的先驱者们对古代白话小说或小品文都是肯定的，因而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然而从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在新文学运动中遭到“革命”打击后最不幸者应是文言散文与文言小说，虽受打击却最不服输者则推旧体诗词。文言散文与文言小说遭受打击后一蹶不振，并不仅仅由于其作者作品日益减少，不足以与白话小说、白话散文抗衡，更在于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两种文体的实际读者与潜在读者也愈来愈少，因而它们趋于衰亡的命运似乎已不可逆转。而现代诗歌领域则呈现出一种在新旧对立中继往开来的总体趋势，一方面新诗虽以革旧体诗词之命的方式而登场，以汉译西方自由诗作为参照，但并没有一种现存的范式可供学习或效仿，一切都

在摸索尝试之中，因而在创作成就上并没有达到先驱者的预期目标，甚至许多早年积极创作新诗的名家到了中老年却“勒马回缰作旧诗”（闻一多语）；另一方面具有民族特色与辉煌历史的古体诗词一直在广泛传播，因而仍有一代又一代作家为其独特的魅力所吸引而继续写作，使其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延续发展，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的主流价值观是提倡“以新诗为主体”，认同新文学运动中关于旧体诗词“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看法，却又给予老年人尤其是高干可以写作和发表旧体诗词的特权。这意味着现代以来关于诗歌的价值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新诗与旧诗之间也长期存在着争论，旧体诗词虽然遭受过新诗的打击，却一直不肯服输，甚至敢于公然对垒，因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期内，旧体诗词的命运也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友康教授以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作为核心论点，正是基于该领域以往分歧与争论颇大，因而成为具有深度拓展空间的重要选题。

在“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这个论题中，实际上包含着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内涵指向，一种指向创作，一种指向批评。二者都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并且皆在延续之中。但相对而言，凡处于完成时态的现代诗词创作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它一方面以文献方式作为处于进行时态之诗词批评的依据与前提，一方面以典范的魅力而对进行时态的当下诗词创作发生影响。友康教授作为长期在大学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却能敏锐地将学术目光投向现代诗词创作的实际成果及正在发展的态势，早在1999年他就明确提出了“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已呈复兴态势”（兼及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与海外华人的诗词创作）的观点，并且一方面结合中国诗歌（含新诗）的特点与实际走向来深入分析旧体诗词在新时期得以复兴的根本原因，一方面针对当时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不遵守形式规则、单纯追求娱乐性和过度媚俗性等弊端提出要“警惕旧体诗词的特性在弘扬中被消解”（《旧体诗词复兴论》）。稍后结合现代诗词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一系列个案（含作家、群体、区域、专题等）的研究，他对现代诗词创作的发展大势做了清晰的勾勒，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旧体诗词被当作腐朽、僵化的艺术形式受到



批判和否定，它在诗坛的主流地位随之失落”，“但旧体诗词是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艺术形式，作为潜在的文学创作和消费活动，在整个20世纪它始终没有停止，80年代以来还呈复兴态势，并积累了可观的成果”。“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诗坛上，新、旧两种诗体实际上是并行发展的，新诗可以列出自己的优秀诗人和优秀文本的清单，建立自身的知识谱系，旧诗也是如此。”（《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正是基于对近百年旧体诗词创作成果的重视和当下旧体诗词创作实际的关切，友康教授才确立了近期的研究目标与学术思路，并以此为前提展开相关的论述。

从批评的角度重新评论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既是友康教授多年来孜孜探求的学术星空，也是本书中最闪亮夺目的理论星辰。早在1999年，他就认识到文学批评对于旧体诗词的“长期缺席”：“与新诗理论和批评的活跃相反，学术界对旧体诗词的创作实践一直持漠视态度。”“一方面，近半个世纪以来，除少量介绍性文章外，从学理上进行高层次探讨的论著基本上没有。”“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不涉及旧体诗词……偶有涉及，也是轻描淡写。这就是说，旧体诗词创作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根本没有自己的地位。”（《旧体诗词复兴论》）后来由此生发，他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展开论述，其中用功最深、影响最大的是刊载在《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一文，其主要观点是：“长期以来，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处于被怀疑、否定或悬置的状态，致使它被摒弃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外，从而造成一部分文学精神资源的人为遮蔽。”“20世纪旧体诗词表现了以自由、民主和主体性为基本精神的现代性追求，从而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和历史；其所蕴含的传统性资源也有助于塑造民族精神。”“学术界要改变对旧体诗词的歧视和压迫，重新审视和界定‘现代文学’范畴，把旧诗纳入研究范围，写入文学史。”该文发表后曾产生强烈反响，并引发了相关问题的讨论，稍后推出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审现代诗词的价值和命运》、《文化失败主义与旧诗命运》、《关于现代诗词的经典化和入史问题——

兼与王泽龙先生商榷》、《现代诗词入史的意义和路径》等文，或是对前文观点的延展与深化，或是针对批评而作的辩驳，都在一定程度上将“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这个论题引向了深入。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都无视现代旧体诗词的存在和价值，把它拒绝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之外，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迄今未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及其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压迫”行为和“形式决定论”认识误区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实际上是新旧诗双线并行的，这是讨论现代诗词价值、地位和前途问题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和逻辑前提。现代诗词命途多舛，不是文学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有“人为阻断”的因素。现代诗词经典性程度不高，不是文本不具备“实在本体”的品质，而是“隐藏于经典构成之背后的权力关系”人为操纵的结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要有“直面历史的勇气”，超越新、旧诗二元对立的模式，打破以形式新旧衡量作品价值和地位的做法，回到就诗论诗的常态，对现代诗词的创作实绩、功能价值和前途命运进行理性的考量并在文学史中有所反映。相对于旧体诗词在文学研究中的遇冷或“缺席”，友康教授似乎更为“入史”的问题而费心伤神，原因并非在于补写文学史过程中如何增设章节等技术层面的切磋，其首要的仍然是思想观念的解放，即如何重新认识现代诗词的价值、地位和命运的问题。

此外，将古典文学修养运用于现代旧体诗词的研究中，从中国诗歌古今联系的视角来审视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也是本书与同类著作有所区别的特点之一。这种贯通古今的审视，既可随手施之于微观阐释，也可精心运用于宏观论证。前者可举1999年发表的《旧体诗词复兴论》一文中关于“旧体诗词的形式意味可能在‘弘扬’中被消解”的一段论述：“旧体诗词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的‘意味’就在格律当中。而诗词格律有严格精微的讲究，不经过大量典范之作的涵泳浸润，不经过专门的学习和长期的实践，要得心应手地掌握是困难的。现在不少旧诗作者，由于才情和学力有限，难以掌握诗词格律，便把格律弃如敝屣，连最起码的规则都不讲，只要凑足字数和句数，就自视为近体或词

曲。……当这些‘不像旧诗’的旧诗在诗坛畅行无阻，当诗词作者认为这是作诗的方便法门而群起效之的时候，旧体的形式意味便在热热闹闹的弘扬中被解构了。这才可能导致旧体诗词的最后终结。”此段论述并未明言古代，所谓“消解”、“解构”、“有意味的形式”也是外来的说法，但旧体诗词包括格律在内的形式规则都是古代就形成了的，今人用当代语言描写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却必须遵循旧体诗词的形式法则，这就像溶盐于水一样，把古今的“意味”都融会贯通了。后者则可以其2015年所撰《中国诗体发展的累积性增长规律》为例，该文首先通过对古代诗体增长的历程进行考察而得出三个结论：一是中国古代诗体随历史发展而递增，呈现为累积性增加；二是新诗体与原有诗体之间不构成取代关系，而是共存关系；三是诗体的地位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升降，但艺术上成熟的诗体不会彻底消亡，一旦定型，它会保持相对稳定。接下来该文梳理佛教传译中国后对于汉语诗体发展的影响，认为中国古代诗体的增生，取决于汉语自身的语言特点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外来影响只是旁助力量，因而以往并未出现过完全横向移植外国诗体的情形。然后文章把古今联系起来展开论述：“从中国诗体发展史和诗体演进规律观察新旧诗体关系，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激进的诗体变革观念是错误的。这种观念认为新诗体和原有诗体是取代关系，新的诗体产生后，原有的诗体就必然消亡或必须消亡。”于是由此得出结论：“新旧诗体的关系是加法关系，而非取代关系。”最后该文提出：当代中国诗坛应“遵循诗体演进规律，构建更富包容性的诗歌生态”。这就真正把中国诗歌的古今区隔打通了，学术界长期漠视旧体诗词的价值及其存在的合理性，是有悖于中国诗体古今演变和中国诗歌价值观念古今演变之规律的。

以上是我怀着欣喜的心情阅读本书文稿后就所留印象和所生体会而进行的一些描述与阐释，虽非对于本书的全面评价，却是结合我本人近年来学术思考的有感而发。作为古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友康兄却长期致力于现当代诗词的探讨，借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在从事跨学科（实为现行教育体制人为设置的学科区隔）的研究，基于其在现当代旧体诗词



研究领域的成果与影响，有的媒体已称他为“著名的当代诗词研究专家”。换言之，友康教授在现当代诗词研究领域的知名度可能已经超越了他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度。或许学界有些同仁会由此生出一些疑惑：这到底是友康教授支援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是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成全或重塑了友康教授？这究竟是古代文学学科的遗憾，还是预示了古代文学学科拓展的机遇？当然，这本来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心的同道在读完本书后，自然就会得出适合自己的答案。

是为序。

黃仁生

2015年10月6日

目录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项目成果简介	001
旧体诗词复兴论	009
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	021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审旧体诗词的价值和身份	041
文化失败主义与旧诗命运——关于现代诗词研究的几个问题	062
现代诗词入史的意义和路径	074
中国诗体发展的累积性增长规律	085
论20世纪学者诗词	097
“五四”诗歌革命和新旧体诗的分流	109
让自由的阳光照遍祖国大地——论现代诗词的自由传统	115
给民族留下永远不灭的正气——简论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	136
说政治表态诗	146
说流放者诗词	153
天安门诗歌运动新说	165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不应排斥现代旧体诗词	172
关于台湾的现代诗词及其研究问题	176
20世纪海外华人的诗词创作	201
晚清—民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诗歌样本——陈荣昌诗述论	210
论老舍的旧体诗	230

漫夸桃李遍天下，更有光风润大千——论苏步青诗词	242
赵朴初的诗歌观及诗词曲创作	252
高情消尽千秋怨 碧血凝成万古诗——论邓拓诗词	263
旧体诗词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成功探索——论厉以宁的旧体诗词	
	274
真情灌注 大气内充——评令狐安《情系彩云南》	289
继武王国维陈寅恪的学人之诗——论萧公权诗词	296
周策纵的旧体诗论和诗作——并回应现代诗词的价值和入史问题	
	329
关于西南联大校歌的意蕴和作者问题	340
20世纪重要诗词集提要	346
新旧诗和解 共同续写中国诗歌史	386
后记	393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项目成果简介

一、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发生激烈震荡和变革的时代，文学上的最大变化就是新文学崛起，传统文学逐渐式微。旧体诗词由诗坛正宗和主流退到边缘，逐渐淡出研究视野，高等学校和文学研究机构不把20世纪已有的旧体诗词作为研究对象；对当下的诗词创作活动，学界也往往保持沉默，不屑于介入，学理化的研究明显缺席，最终导致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不具有合法身份。但旧体诗词是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艺术形式，作为潜在的文学创作和消费活动，在整个20世纪它始终没有停止，并积累了可观的成果，80年代以来还呈现出复兴态势。本项目的研究目的就是对20世纪旧体诗词的创作家、创作成果和创作活动进行较为系统、客观的描述和评价，总结20世纪旧体诗词取得的成就，使现当代中国文学中这一重要文学现象得以呈现，其价值得到彰显，以挖掘、丰富现代精神资源，并为确立它在社会生活、文学格局中的地位，构建更为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提供参考。

旧体诗词在现当代文学中不具有合法身份，它的价值和地位一直不被承认，或者悬而未决。改革开放以来，“重写文学史”已经掀起几次热潮，每一次重写都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学史中的面貌，但“重写”的都是新文学，旧体诗词从未被纳入“重写”的范围。“重写”其实包含“改写”和“补写”，所以每一次重写都有一些新的作家作品被发掘出来，但旧体诗家依然销声匿迹。在重写者看来，旧体诗词先验地没有“重写”的资格，所以不存在“补写”问题。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和

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中旧体诗词问题的缺席、被忽视或被悬置，再次印证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承认旧体诗词的合法性。本项目的研究对改变这种状况，改变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偏颇观念，从而改进我们的现当代文学观具有积极意义。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1. 成果的主要内容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研究内容是20世纪迄今的旧体诗词。研究成果分析了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几个重要历史时段为重点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发展过程作了简要概括；然后按照作者的身份分别对新文学家、人文社会学家、政治人物、自然科学家、艺术家等的诗词创作活动和创作成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归纳出各种类型诗词的特点，并对重要人物的创作情况进行具体介绍和评价；还以专章介绍了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及海外的诗词创作情况；在较为全面地描述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情况的基础上，最后一章进行总结，对现当代诗词的特点、价值、地位、未来命运和存在问题进行较为学理化的讨论。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对传统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注不够的一些重要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人、学者、官员往往三位一体，学者是诗词创作的主要作者群体之一，自然具有文学史的合法身份。进入现代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成为职业化行为，学者不再被视为文学的创作者。所以，即使有大量各种类型的学者从事诗词创作并留下可观的成果，但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不把他们作为考察对象。实际上，学者的诗词创作是20世纪中国一种具有独特意味的文化现象。《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把学者诗词作为重点，分析了其创作的民间性、自娱性、专业性和典雅性等特征，并以较大篇幅评析了人文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的诗词创作情况，肯定了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认为应把他们的创作成果纳入现当代文学史范围。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20世纪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旧体诗词的发展过程、创作成就和思想贡献，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当代诗词的价值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貌。旧体诗词是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它被当作落后、僵化的艺术形式受到否定，人们认为，旧体诗词的历史命运已经终结。因此，学术界长期不把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对它的系统化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对20世纪旧体诗词的研究有所开展，但大多局限于诗词圈内的常识性讨论，学术价值有限。21世纪以来，学术界的研究增多，多部专著出版，旧体诗词的合法性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但现有成果有的侧重于某一时段的诗词研究，有的侧重于某一群体的研究，《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全方位研究现当代旧体诗词，系统性更强。

2. 成果的主要观点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分析了现代诗词被忽视或得不到认可的原因，指出，现当代诗词命途多舛，除了文化上的激进态度使中国新文学的创立者、辩护者没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区分，往往笼统否定，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作用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没有对传统文体在现代社会的不同命运进行区分。“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用文言文写的散文、骈文、赋、小说等全面退出文坛，白话文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旧文章的成绩和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旧诗虽然是新文学不遗余力排斥的对象，但它却始终顽强地生存着，传统诗人依然我行我素；新文学家也保持对旧诗的爱好，乃至于“勒马回缰作旧诗”（闻一多语）；新的诗人也在增生，这样就造成旧诗一枝独秀，挺拔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局面。在20世纪中国诗坛上，新、旧两种诗体实际上是并行发展的，新诗可以列出自己的优秀诗人和优秀文本的清单，建立自身的知识谱系，旧诗也能建立自己的清单和谱系。研究者对传统文体在中国现当代的不同表现没有加以必要的区分，一概认为传统文学形式已经无所作为，当然就难以对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本研究项目对20世纪旧体诗词的优秀诗人和文



本进行了归纳梳理，是建立现当代旧体诗词知识谱系的一次尝试和努力。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对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合法性、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未来发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旧体诗词的现代价值和命运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长期以来，20世纪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处于被怀疑、否定或悬置的状态，致使它被摒弃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外，从而造成一部分精神资源被人为遮蔽。本成果引入“现代性”概念，对旧体诗词的思想价值和精神贡献给予较新阐释，从根本上确立它的社会合法性和学科合法性。研究表明，20世纪旧体诗词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性追求，自足地构成一种新的诗歌传统和诗歌历史。

《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认为，要为20世纪旧体诗词确立合法性，关键看它是否为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成果。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特别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步，由十年“文革”向新时期的转折，对诗词的思想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当代诗词从总体上看基本摆脱了使它招致严厉抨击的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呈现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精神风貌。虽然仍有不少作品把历史创造和社会进步的艰难掩盖在空洞的口号之下，但是更多的作品表现了对真、善、美、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注和追求，对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渴望，具有浓烈的现代色彩。这就使它与古代诗词产生了根本的区别，足以构成中国诗词发展史上一个新的、独立的时代。在现当代诗词中，举凡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自然万物、人间情愫、诗文艺术、科学成就等等，凡是现代社会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都有深入周到的反映，呈现出现代世界的多样性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在某些时候，旧体诗词文本还代表了时代精神的高点。优秀诗人的作品既代表了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达到的高度，又为旧形式开辟了新境界。20世纪诗词中的不少优秀之作已经完成了经典化，它们像古代佳作和新诗中的优秀作品一样传诵人口，滋润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涵养了人们的品格节操。这才是为20世纪旧体诗词确立合法性的终极性价